

难忘的120天

忆 胡耀邦同志
在中国科学院的日子

中国科学院京区党委



难忘的 120 天

——忆胡耀邦同志在中国科学院的日子

中国科学院京区党委

北 京

2013年7月第一版 开本: B5 (720×1000)

2013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1 1/4 插页 2

字数: 200 000

难忘的 120 天 | 前言

——忆胡耀邦同志在中国科学院的日子

1975 年 7 月 22 日，胡耀邦受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委派，到中国科学院工作，11 月，就因“四人帮”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而再次被打倒。虽然他在 1977 年 3 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后才正式离开中国科学院，但他在中国科学院实际只工作了 120 天，确切地说是 116 天。

在胡耀邦光辉一生的近 60 年革命生涯中，120 天只是短短的一段经历，在他可歌可泣的辉煌业绩中，这段工作可能也只占百分之几，但胡耀邦曾说过，他很怀念这一段时期。这是因为他对我国的科技事业，对我国的科技人才，对中国科学院，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和殷切的期望。

相比中国科学院 60 多年的历史，120 天也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却在中国科学院以及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史中添加了浓重的一笔，在中国科学院的广大干部和科技人员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怀念。

在这 120 天中，面对当时充满惊涛骇浪的政治生活，以及奄奄一息的经济和科技，胡耀邦以对党的事业的一片忠诚，把中国科学院看做是党“最后一次分配给自己的工作岗位”，投入了全部身心，倾注了全部感情，把郁结在心里的对“四人帮”的怒火，化成掷向“四人帮”的一支支投枪，同他们进行了正面的交锋。

难忘的120天

——忆胡耀邦同志在中国科学院的日子

在这 120 天中，他认真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全面整顿的方针，尽最大可能纠正“左”的错误，解决困扰科技工作者的实际问题，领导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实事求是地反映科技战线的实际情况，并制定了中国科学院的长远发展规划，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给科技工作造成的不良影响。他的工作，使广大科技工作者在沉重的政治阴霾中呼吸到了一缕清风，使中国科学院被压抑了十年之久的干部和科技人员舒了口气，看到了希望，激发了斗志，坚定了做好科学研究工作为国效力的政治方向，为“科学的春天”的到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另外，胡耀邦同志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关心和爱护被传为佳话，至今人们仍深深地感念着“五子登科”的故事。

在短短的 120 天中，胡耀邦以他耿直的骨气、无畏的精神，以及率真的性格、奔放的热情、明快而又诙谐的语言、敏锐而睿智的才华所形成的人格魅力，展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大形象，感染着、鼓舞着并长久地影响着人们。

在本书中，我们通过一篇篇纪念文章，回顾了耀邦同志在 1975 年担任中国科学院领导的 120 天里，进行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纠正“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左倾”错误，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开展科研工作的点点滴滴，展现了他忠于党的事业、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不畏艰险、勇于创新的思想境界，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以表达当事人对他的怀念，也希望千千万万的青年科技工作者能够真实地了解中国科学院的历史，了解那些为中国科学事业健康发展呕心沥血的领导人，以更好地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提升自主科技创新能力，推动中国科学院“创新 2020”各项任务的顺利实施。

难忘的 120 天 | 目 录

——忆胡耀邦同志在中国科学院的日子

前言 / i

忆耀邦同志 / 吴 昭 / 1

锐意整顿 英灵永存 / 韦方安 戴以夫 沈文雄 / 7

1975 年整顿中国科学院的前前后后 / 李 昌 / 12

难忘的一百二十天 / 吴明瑜 罗 伟 / 26

从《汇报提纲》到“难兄难弟”——我与胡耀邦的一段交往 / 于光远 / 48

重新看到了希望——胡耀邦与系列“百家争鸣”座谈会 / 葛能全 / 72

“五子登科”——忆耀邦同志关心科技人员往事 / 武炳升 / 82

忆胡耀邦同志二三事 / 顾迈男 / 89

有力的支持 有益的启示——重温胡耀邦同志对科技情报工作的批示 / 虞鸿钧 / 96

纪念胡耀邦同志 / 江 龙 / 105

“你们要大胆地投入工作”——胡耀邦同志来到中国科学院 / 林文澄 / 109

坦荡无私 亦官亦民 / 李瑞旭 / 111

我送耀邦见小平——忆耀邦同志二三事 / 赵宇明 / 115

胡耀邦同志与共青团中国科学院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40 周年大会 / 张景秀 / 119

难以忘怀的印象 / 高 陵 荀瑞昌 / 124

危难中的关怀——忆胡耀邦同志视察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徐联仓 / 128

让队徽团徽党徽与之永远相伴的传奇人物——回忆一段胡耀邦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以及我本人的影响 / 颜基义 / 136

大刀阔斧 拨乱反正——胡耀邦与半导体研究所 / 李维学 / 145

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的日子 / 王丹红 / 150

后记 / 172

忆耀邦同志

吴 昭

胡耀邦同志，“文化大革命”初被批斗、罢官，直到1975年7月，才恢复工作。对于复出，耀邦同志珍惜有加，他顶着酷暑，走马上任。工作起来，席不暇暖，食不甘味，没日没夜。为了整顿和恢复科技管理和科学研究的秩序，抓紧给中央起草工作汇报提纲，作调查，听汇报，看资料，讨论，修改，再讨论，再修改，字斟句酌，小心谨慎，辛辛苦苦三个月，结果，却被诬为“大毒草”。

“大毒草”，当然是欲加之罪。

1975年7月的一个下午，我们正在机关院内劳动，戴以夫叫我去接耀邦同志。自周荣鑫调到教育部后，让谁来主持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科学院）的工作，中央一直在酝酿。到这时，算是尘埃落定。临出发时，军代表王建中嘱咐：到了打个电话。

到了富强胡同5号，耀邦同志已等在大门口。新理的平头，衣着朴素，身躯笔直，很精神。我开车门下车，他已伸出了右手，我说欢迎耀邦同志，就要进门打电话，耀邦同志一下拦住我说：“没必要，没必要。”

耀邦同志的办公室，在2楼1号。周荣鑫走后，一直空着。这天，打扫得窗明几净。耀邦同志微笑着走到办公桌前，两手一拄桌子说：

难忘的120天

——忆胡耀邦同志在中国科学院的日子

“哈哈，我要拴在这里了！”

此后几天，耀邦同志向科学院的有关同志传达中央领导的指示，听取关于科学院的情况介绍，并部署向中央起草一份报告，即后来大家知道的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一天散会后，他要我领他到各局走走。临近下班，人已不多，我们只向值班室、打字室的方向看了看。第二天，我们到四局、外事局，他们的领导，有事外出。再到三楼，业务二组赵震平在，谈了一会儿。政治部萧剑秋在，看他没事，耀邦同志就坐下来，先问了一下工作，就谈起他在延安的一些事：一次毛主席叫他主持会议批判张国焘。主席嘱咐，要给张国焘准备一把椅子、一支笔、一张纸等。为什么讲这些呢？我猜想，耀邦同志心里一定有多年来解不开的困惑。三十年前，我们党对待犯错误的人，台上还放把椅子；三十年后，社会竟如此“进步”，被批斗的老干部，都坐上“喷气式飞机”了！

耀邦同志复出，第一次在群众场合露面，是1975年7月底8月初，主持范长江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范长江同志是著名记者，新中国新闻事业创始人之一。他曾在1935年，追踪红军长征的足迹，写下69篇通讯，报道红军的真实情况，轰动全国。此后，他领导过新闻团体、通讯社、报社、新闻学校，为我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曾任新华社副总编辑，《解放日报社》《人民日报社》社长、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等职。20世纪50年代末，调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兼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科协）党组书记。他是我国新闻界的大人物，“文化大革命”初，因为一首小诗，反映全民大炼钢铁后，南方有些地方，山不青了水不绿了，结果就从天上一下掉进深渊，成了反对“三面红旗”“黑帮”“三反分子”。被批斗、抄家、关押、下放。1970年10月23日，范长江在河南确山干校，不堪受辱，投井自尽。死后，其头上还压着一顶沉重的“反革命”的帽

子。按说，就算是一个普通百姓，到这个份儿上，也该给句公道话，哪怕只有一句。范长江的夫人沈谱，就为这一句，奔走了四年多，终于在1975年7月得到毛主席“给予纠正”的批示。怎样纠正？今天来说，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可在当年，这里就很有学问。

那天，来八宝山的有原科委、科协的同志，也有文化界、新闻界的一些人。当时有不少人向耀邦同志握手致意，沉寂了七八年后，随着小平同志复出，耀邦等一批同志也走出来了，许多人心里燃起了希望之火。大家想，阴霾的天气可该结束了。但是，又有谁能想到，一场大的风暴就要铺天盖地到来了呢！大家从第一告别室排成两路纵队，向骨灰堂走去。领头的是耀邦同志和茅盾先生。茅盾先生那年已79岁，腰有病，已弯得快90度了，拄着拐杖。

在回来的车上，耀邦同志说了一句话：“也只能这样了。”话里包含了许多无奈。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12月，耀邦同志调到中组部工作，当月，范长江彻底平反。

1970年6月以后的科学院，是由科委、科协、科学院三家合并而成，仅在京单位就有近50个，职工三万余人。经过“文化大革命”“四人帮”的破坏，科研工作都失去了章法，问题成山。一位院领导曾深感科学院工作之繁：下班即上班。白天在机关忙，下班在家里忙，人和电话随之跟到家里，日复一日。耀邦同志从原团中央把梁金泉同志调来，让他住在家里，缓解了不少压力。

有些事光靠科学院，解决不了。例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迁后，铁道兵司令部进驻，研究生院要这个地方，多次商谈无果。耀邦同志拿起电话就给铁道兵司令员吴克华通话，请求帮忙。科学院许多生活上的问题，耀邦同志操起电话，就找北京市市委书记吴德同志。“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许多工作停滞，使本该及时解决的事，积压

难忘的120天

——忆胡耀邦同志在中国科学院的日子

起来，房子、液化气炉子、小孩入托等都是广大科研人员的后顾之忧。耀邦同志在抓好其他工作同时，为了这些事，费了不少精力。人们戏称“五子登科”。

有两次耀邦同志问我，你看科学院还有哪些工作要抓。耀邦同志在百忙中，唯恐工作有什么疏漏。

耀邦同志到科学院的前一个月，即1975年6月9日，中央刚为贺龙同志举办过骨灰安放仪式。只因有人诬陷，一位元帅就被审查迫害致死了。怎么向人民交代？这才有1974年中发[25]号文，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说“审查是必要的”。人被迫害致死，说是病故，一般群众恐怕都接受不了。一位老科学家曾找耀邦同志，希望组织能出面查查他儿子是怎么死的？领导知道，不否定“文化大革命”，许多问题就查不了。查不了，群众来谈，又不能不听！

夏天，天气比较热，那时的领导办公室，既无空调，也无电扇。我和耀邦同志办公室的门对开着，自然通风。耀邦同志有份已经拿了两天的稿子，说要用半天看完它。稿子刚在桌上摊开，古真同志（信访室的干部）就进去了。古真说她爱人死的事，要求组织能实事求是，有个说法。由于初次见面，很多事情不得不从“三皇五帝”开始谈。这样，耀邦同志就不得不放下手里的工作。按说我应该挡挡，请先找别的领导去谈，或写份材料。因是熟人，也出于同情，我没有。

还有一次，在办公室，耀邦同志当着梁金泉和我的面，明确我管文件。随着天气晴转阴，继而狂风暴雨，没有了文件，也没人找耀邦同志说事，代替的是批判和斗争。院子里大字报中，有一张写的是：科学院来了三个大右派（指耀邦、李昌、王光伟同志）。“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开始，耀邦、李昌同志靠边了。王光伟同志说，我们是一起来的，事情是一起干的，我也应该下去。中央不同意，留下主持搞批判。耀邦和李昌同志到科学院，工作时间不长，但那种深入基层

联系群众的作风，敬业、勤奋、务实、求真的精神，为科学院办了一些实事，搞出了一个符合科研实际的汇报提纲，受到广大群众的好评。但在某些人眼中，这就叫“右倾翻案”。科学院的造反派于1976年2月末3月初，在首都体育馆——有一万八千个座位的场子，开批判胡耀邦、李昌的大会。科学院在京人员一半多都用汽车拉来了，声势很大。那天耀邦同志住院缺席，李昌到会。大会刚开始，有人递上条子说，谁是李昌，我们不认识，应该让大家见见。于是，李昌从座位上站起，在一万多人的场子里，有人大喊：“看不清楚！”大会主席就让李昌绕场转一圈，可是没想到，李昌走到哪里，哪里就报以热烈的掌声。走一圈，带出一圈的掌声。这个批判会开的，成了对胡耀邦、李昌的欢迎会了。不过也不要小瞧大会组织者，大会一开始，他们就把体育馆的大门都上了锁，真正做到大会自始至终无一人提前溜号。

大会发言开始了，下面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一万多人开小会，嗡嗡声压过了大会发言。更有三三两两地跑到休息厅里去，一堆一伙地抽烟、聊天、嬉闹。不一会儿，休息厅里边人多得跟赶庙会一样。当时一些到会准备拍照报道的记者，面对稀稀拉拉的会场，来回进出走动的人们，端着摄像机没法拍，只好取消第二天见报的计划。在那场“伟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科学院唯一的一次批判胡耀邦、李昌的大会，竟搞成这样，“四人帮”当然很生气，但明面上却表扬科学院等单位搞得好。因为他们总不能向毛主席这么交代：现在大家都批不起来。为什么非表扬科学院？这就是，你看科学院不行，许多单位的批判会，还不如科学院！

1976年8月中旬，中央给王光伟同志一封绝密亲启件，王光伟看后，他的秘书沈文雄过来告诉我，是通报毛主席病危的。耀邦同志自8月初，由大连批斗后回京，就住院了。下午我带了几本内部刊物，

难忘的120天

——忆胡耀邦同志在中国科学院的日子

由张计虎开车到协和医院，那时耀邦同志住协和医院南楼三层最东头的一间病房里。我报告了主席病情，他从躺椅上起身，充满惊异和忧虑的眼神凝视着我足有半分多钟。我说我还带了几本刊物。耀邦同志看也没看，慢慢躺下，摆摆手说：我什么也不看，我要休息。不过他那凝视的眼神，让我好长时间都忘不了。

1989年4月15日，中国一位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曾经担任我们党的总书记的耀邦同志去世了。他走完了他光辉曲折的一生。开追悼会那天，我望着耀邦同志的大幅彩照，似乎又看到那惊异忧虑的眼神。

(2006年6月14日 北京)

作者简介

吴昭，男，曾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干部、院部机关党委副书记、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党委书记。

锐意整顿 英灵永存

韦方安 戴以夫 沈文雄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是三十几年以前的往事。对于我们这些年逾耄耋或者已达古稀的老人来说，虽然记忆力大大减退，但是仍然留下了许多挥之不去的记忆。其中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当时的科学院是全国“重灾区”之一，通过科学院可以看到全国的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由 1966 年以前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可喜局面，骤然变为一片萧条的景象：“浩劫”降临，郭沫若院长、张劲夫同志首当其冲，受到严重威胁、极大冲击与迫害，甚至丧失了自由和领导权。然后几乎所有的高级研究人员都被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统受到批判和斗争，其中许多科学家被关进了“牛棚”，赵九章等一批极其优秀的科学家被迫害而含冤去世；一些科技人员更是不务正业，在所谓“开门办所”“下楼出院”口号的蛊惑下，离开了自己长期从事的研究工作岗位；由于研究工作的停滞，有一些本来已经在国际上居于先进地位的研究领域又变得落后了。总之，当时科学院的科学研究工作已经起不到第一生产力的作用。面对这些铁的事实，凡是具有爱国热情和有事业心的广大科研人员，无不心急如焚：中国科学院向何处去？

当时我们虽然不在科研工作第一线，但是通过执行国家发展科技事业的“十二年远景规划”，贯彻执行了“十四条”和“七十二条”，

难忘的120天

——忆胡耀邦同志在中国科学院的日子

我们亲眼看到了科学院全院职工对于发展科学技术事业所蕴藏着的巨大的积极性，也目睹了科学院科学技术事业蓬勃发展，成为全国科学技术事业火车头的具体事实；我们甚至还了解到后来众所周知的，科学院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参加研制“两弹一星”的一些情节。所以，我们和全院广大科技人员是心心相通的。想到过去的巨大成就，对比当时那种落后的困境，作为共产党员的我们，对祖国科技事业发展前途深为忧虑。

1974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全面主持中央党政军的各项工作，相继在各部门、各地区开展了行之有效的整顿工作。这些春风化雨的好消息，使我们在困惑中看到了希望，我们急切地盼望着科学院也能进行全面整顿。

1975年7月，受党中央之命和委派，胡耀邦、李昌和王光伟同志等到科学院工作。当时我们高兴地意识到，科学院的历史将要翻开崭新的一页了。

胡耀邦同志等带着中央交给他的三个任务，兴致勃勃地来到了科学院：一是了解情况，向中央汇报；二是做一个科学院的发展规划；三是向中央提出科学院的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名单。由此可以看出，中央要把握住科技事业的领导权，在此基础上，把科学院的科学研究工作推上正轨。

当年胡耀邦等同志来科学院时，我们都在办公厅工作。记得耀邦同志等是7月18日来到院部机关就职视事的。为了迎接他们的到来，在前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周荣鑫同志的安排下，中国科学院先派出戴以夫和武炳升同志到东城区富强胡同胡耀邦同志家里，征求他在办公条件等方面的要求和意见，他们两人得到耀邦同志的亲切接待，但是没有提出任何具体要求；与此同时，院机关又专门设立了一个临时秘书工作小组协助工作，以适应耀邦等同志来科学院后进行调

查研究的需要。领导上指定应幼梅、宋振能、杨立芳和韦方安四人担当这项任务。当时的分工是，宋振能同志负责文字并提供相关资料；杨立芳同志随同耀邦同志下所调查研究，做好记录；应幼梅同志和韦方安留守机关，负责内勤和协助办理若干文书和相关事务，便于和各方进行联络。这项工作使我们有机会直接领略到耀邦同志的领导艺术、精神力量及高尚风范。

(1)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耀邦同志满怀信心地把充分地调查研究、搞清楚科学院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作为首要任务。他到了科学院工作后，很少在办公室待着，几乎天天往各个研究所跑，参观有关的实验室，和广大科技人员一起座谈，广泛接触，听取意见；要求大家想办法多出科研成果，早出科研成果，“科研成果多多益善”“科学院的根本任务就是多出科研成果”。这些提法在现在看来，完全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在动乱年代的科学院，耀邦同志的要求鼓动了广大科技人员受损的心灵，使他们重新燃起希望的火焰。他们向耀邦同志敞开了心扉，诉说了当时所面临的由于动乱带来的各项困难。耀邦同志经过广泛调查研究之后，概括出要解决好广大职工生活中的“五子登科”问题，即从房子（住房困难）、票子（工资低）、妻子（两地分居）、孩子（上学、入托儿所难）、炉子（煤气罐）等问题入手，为科研人员解决后顾之忧，最大限度调动广大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的积极性。耀邦同志在办公室曾经不止一次地向我们指出，他自己的工作就是要吃透两头，既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向他们提出的工作要求，更要努力实践，到群众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因此，重要的是到群众中去，不能过多待在办公室。包括签发公文，他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除了向中央的重要问题的请示或报告由他过目决定外，一般的公文处理可以请李昌同志审定签发。耀邦同志这种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和领导艺术，犹如一股凉爽的清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难

难忘的120天

——忆胡耀邦同志在中国科学院的日子

以忘怀。

(2) 高瞻远瞩，对革命前程的未来倾注着炽烈的热情，充满着无限的希望。耀邦同志来到科学院后，以较短的时间，在京区的广大科研人员和职工中，开展了革命的理想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他好像是一团火，走到哪里，哪里就燃烧起熊熊的火焰。这在人心涣散的动乱年代，实在是惊天动地的事情。耀邦同志每一次讲话或报告都富有新意，由于表达了广大知识分子内心的理想和追求，理所当然地受到十分热烈的响应。很多科技人员反映说，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精彩的讲话了。特别是在1975年10月24日举行的全院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的大会上，耀邦同志以高昂的革命激情，号召科学院的广大职工“进行新的长征，把中国建设成四个现代化的强国”，在整个科学院乃至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震撼。虽然到了这一年的11月，耀邦同志被迫终止了在科学院的领导工作，但是他的声音如同战斗的号角却一直在全院职工的心中回荡。所以当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耀邦同志在科学院的这些讲话，成了科学院广大知识分子解放思想，进行改革开放的先声。

(3) 必须紧紧把握住科学院的领导权。按照当时邓小平同志整顿各行各业的指导思想，整顿的目的就是要把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手里。耀邦同志在科学院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最后的立足点集中在调整科学院党的领导班子，提出以郭沫若任组长，胡耀邦为第一副组长，李昌、王光伟为副组长的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的组成名单。在这个名单形成的过程中，耀邦同志在会上会下，不止一次地阐述过，对于那些在科学院直接制造动乱的造反派头头，只要他们改邪归正，切实改正错误，也还要给予悔过的机会，要立足于教育和挽救，不要一棍子打死。但是耀邦同志宽广的无产阶级的伟大胸怀，并没有感动那些权欲熏心的造反派。当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以后，这些